

●本期特稿

特约主持人:张春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语:教材建设作为教育基石,深刻反映国家发展导向与文化遗产使命,是国家教育事业重要组成部分,是体现国家意志、落实国家事权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基础教育教材承载着基础教育阶段课程教学的核心内容,影响着教学的方式方法,对教育强国建设至关重要。2022年教育部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及各学科课程标准,对课程方案、课程标准、课程内容、评价方式等均作了调整,不仅重塑了课程框架与标准,更引领了教学内容与评价体系的革新。今年9月,与新课标相配套的新教材开始推广应用。新教材承载着新时代教育理念,通过重大主题融入教材,强化学生国家意识与文化自信,通过优化课程设计、丰富教学内容、创新评价方式,深化基础教育改革,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坚实基础。新教材究竟体现着什么样的新理念,如何帮助我们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助推教育强国建设?在新教材的运用当中,如何落实重大主题进教材?这些问题得到了学术界和一线工作者的普遍关心。对教材的日益关注,也推动了教材学这一研究方向的兴起。教材学应该如何构建,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教材改革?诸如此类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探讨。本专题邀约相关专家学者,从新教材的理念解读、功能定位、重大主题进教材和教材学建设等四个方面,对新教材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相信专家们的真知灼见,可以为我国基础教育教材建设及其应用提供有益的参考。

基于新课标的新教材编研与应用(笔会)

张春莉 王天平 李洪修 余宏亮

摘要:加强基础教育教材建设,是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助推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础。需要针对新教材推行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新问题、存在的政策盲点与实践缺位,建立强有力的课程改革支持体系,保障新教材使用工作的稳步推进。基础教育教材要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建立多层次的教材建设制度;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构建自主性的教材资源体系;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形成立体化的教材服务体系。将重大主题教育有机融入教材,要立足学科教材的基本内容,覆盖不同主题要素,采用多元化渗透方式,统筹编排重大主题教育内容。随着教材研究规范化、学科化,教材学正在成为一门具有普适性的独立学科。探索教材学学科建设也是构建中国特色教材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创新之要。

关键词:新教材;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育强国建设;重大主题教育;教材学

中图分类号:G6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24)03-0001-20

DOI:10.19563/j.cnki.sdjk.2024.03.001

新课程新教材实施的关键要点与支持体系建构

张春莉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1 年以来的新课程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投入人力和物力最大的一次课程改革。此次课程改革在课程目标、内容、实施、评价和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变革,激发了学校课程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的活力,打破了单一的学科课程结构,极大地丰富了学校课程的门类,促进了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全面个性发展。^[1]2022 年,面对中央的新部署、教育发展中提出的新要求、课程实施中发现的新问题,教育部教材局发布了《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 版)》,进一步完善了课程培养目标,优化了课程设置,细化了实施要求;将党的教育方针具体化和细化为课程应着力培养的学生核心素养,优化了课程内容结构,制定了学业质量标准,其指导性不断增强。^[2]

2024 年秋季,全国将分年级逐步推进新修订基础教育教材的选用和使用工作,部分地区可能要重新选用其他新版本的教材。然而,教材选用过程的不规范,教材使用过程中教师对编写意图的不理解、对内容变化产生的畏难抵触情绪等,均会给教材的推进工作和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的风险。为此,2024 年初,基础教育教材综合研究基地工作组在全国部分省市地区开展问卷调查和教师座谈,希望通过调查分析评估基础教育教材工作中教师们关注的重大热点、焦点、难点问题,针对新教材推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新问题、存在的政策盲点与实践缺位,提前谋划,保障新教材使用工作的稳步推进。

一、教材选用与使用的意见调研

基础教育教材综合研究基地工作组结合问卷调查和座谈,共开发两套相互补充的测量工具,从新教材选用方式、对新教材的态度、面临的挑战以及新教材的培训等四个维度对教师展开调研。参与调研的教师共 5 747 人,来自四川、广东、北京、河北、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等 17 个省份,涉及语文、数学、英语等 14 门学科。

(一)新教材的替换方式

教师认为学生和教师替换教材可分开进行。对于学生教材的替换,28.43%的教师认为具体替换方式可由各地自行安排,三年内替换完毕;23.07%的教师认为可以一、二、三年级同时换,四、五、六年级滚动。也有近四分之一的教师认为可以所有年级统一替换新教材,以便于集体教研,落实课标要求。教师也反映,以往教材替换过程中前三年一、二、三年级滚动换教材,第四年四、五、六年级同时换教材时,后换教材的年级教师在教学理念、备课、研讨过程中相对落后。

(二)对新教材的态度

对于新教材的态度,近 70%的教师首要担心熟悉新教材的时间问题,以及新教材需要的教学资源是否能够及时配备。此外,教师比较担忧的问题有考试评价与教材的更新是否对接(43.54%)、教师和学生对新教材的适应程度(42.96%)、教材内容的变化情况(40.87%)。也有近三分之一的教师对非起始年级的新旧教材衔接等问题比较关注。

(三) 新教材带来的挑战

调查发现,在新教材使用这一问题上,教师们认为在大概概念统领的大单元教学的理解或落实、对学生核心素养与学科领域的核心素养的理解或落实、课程内容结构优化的理解或落实等三个方面存在较大困难和挑战,持相关观点的人数占比分别为 66.63%、65.11%、53.47%。此外,教师感到在学习任务群、跨学科主题学习、项目式学习以及学科实践活动的理解与落实上也存在一定困难,人数占比分别为 47.49%、46.49%、40.46%、37.71%。可见,针对此次课程改革的诸多变革点,面对新教材带来的挑战,教师们最担心的风险、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相应的教研管理措施、评价体系、配套资源的同步更新问题。

(四) 对新教材的培训的期许

为落地新课标与新教材的理念,教师们普遍认为培训应走在教材替换的前列。教师们所期待的新教材的培训方式依次如下:实际教学观摩(71.18%),教材解读与现场答疑(68.17%),专家实践指导和辅导比较(59.54%),案例分析(59.84%),在线培训(50.25%),现场座谈研讨(40.54%)。座谈中,教师们较为担心自身对新教材教学内容组织方式的内在逻辑的理解不够,操作起来难度大。因此,教师们表示非常渴望学习一些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精品示范教学案例。

二、推进新课程新教材实施的关键点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指示精神,谋划好能够服务高质量发展、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服务“四个面向”等支撑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治理项目,基础教育教材综合研究基地围绕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展战略支点论证研究,认识到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需要进一步增强一线教师的变革信心。而增强教师们的变革信心需要加强理论指导、政策保障与实践深挖。

(一) 理论的指导

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基于现实的、具有可行性的研判。《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是我国第一个以教育现代化为主题的中长期战略规划,而深化改革是这一战略规划下的关键举措。深化改革不仅是为了适应时代变革的紧迫需求,使教育体系更符合现代社会需求,也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际应用能力的关键路径。在当前经济与社会创新驱动发展的趋势下,人才培养具有决定性意义,深化改革就是要在战略层面加大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力度。通过扭转当前“造成资源浪费的教育内卷”的局面,转而形成“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良性竞争”,能够让基础教育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转型。新课程方案和新课程标准是对过去课程改革中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对于即将推出的新教材,教师要在拿到新教材的同时,回到新课程方案和新课程标准中去认真领会大概概念统摄下的单元整体设计、主题式或项目式学习、跨学科教学实践等新的变革点的精神和内涵,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在落实核心素养促进深度学习的过程中,探索教育教学的新样态,创新课堂教学实践,不断释放教育发展活力,让教材成为国家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载体。

(二) 政策的保障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3]。“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论断,也是这一思想继续发展创新的内在根据,更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方法论基础。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单独成章布局,吹响了“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号角,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纳入 2035 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4]可见,“两个结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作为指导思想与战略方向,能够推动建设整体的、与文化相关的教育

体系的发展,为满足多样化和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

(三) 实践的深挖

实践的深挖,一方面要积极应对新时期对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不能把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新教材,而要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另一方面还要直面不利于学生发展的各种问题,认识到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尊重科学的教育规律,处理好育人和育分的关系,提高学生的学习获得感。为此,广大一线教师应成为新课程和新教材的积极践行者,为学生们营造有利于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教育生态。一要树立坚定的信念。充分认识到新课程方案与新课程标准在理念上的先进性,在教材使用过程中始终把课程的育人价值和育人功能放在首位。二要边实践边研究。应本着循证教育理念开展循证实践,尤其要加强教材容量与难度、课程设置与课时安排、学科内知识整合、教学评一致性、指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课程开发或教材编写等循证实践。三要落实核心素养实现五育融合。要认真领会这次义务教育新课程修订贯彻的两大理念,即“综合化”和“实践性”,在教材编写和使用中统筹设计综合课程和跨学科主题学习,将知识结构化以加强学科内和学科间的知识的联系,创设真实性情境以打通学生的学习世界与真实的生活世界的联系。总之,充分发挥实践者的智慧,在谋求变革中学习变革,在尝试创新中学会创新。

三、建立有力的课程改革支持体系

自2022年4月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颁布以来,教师们就对课程改革充满了期待,此次调研同样反映出教师们既期待又焦虑的心态。一方面,教师十分期待新教材,希望新教材的推出能充分体现课程方案提出的变革点并解决这些变革点所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教师对能否适应新教材以及新教材是否会带来更大的挑战和增加学生学业负担充满担心。在课程改革中,无论“等待派”还是“焦虑派”,均不利于新教材的稳步推进,需要高度重视和积极回应课程改革的挑战。

基于此,我们应坚定改革的信心,立足已取得的成就,聚焦当前基础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对新教材的选用与使用风险做出客观评估,对新教材实施中的风险进行积极防控,合理借鉴国际教育改革的先进经验,通过新课程理念宣传、教材培训、优秀精品教学案例的培育和推广等一系列举措建立起有力的支持体系,服务于一线教师。让广大教师认识到此次新教材的推行是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在继承中变革,在变革中创新,需要广大教师勇于变革的信心和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的智慧,需要广大教师成为新教材的“积极践行派”。只有赢得广大一线教师的理解和支持,激发和释放教师的课程开发活力,才能保障新教材的稳步推进,打赢这场适应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建设新时期教育强国的“攻坚战”。

(一) 配套分层分类、多元协同的师资培训与支持体系

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是新课程改革成功的关键。新一轮改革需要注重教师培训,帮助教师更好地理解并应用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英国联合政府教育部发布的《教学的重要性:学校白皮书2010》将改革重点从学生转向教师,并指出:“教师素质是影响学校办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决定着学生成就的好坏。”^[5]结合调研结果,不难发现此次课程改革和新教材的推行,是推动学校变革,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机遇,既为教师提供了更多的专业发展机会,也能够帮助教师更好地适应新课程的教学要求。

为回应教师的诉求,可以补充和完善师资培训的队伍,聚焦教材解读、问题答疑、实践指导等方面为一线教师提供针对性的辅导和培训;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配套师资培训体系,根据教师的经验、教育背景和能力水平,将教师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等不同层次,有针对性地为不同层次的教师提供新教材培训;还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和途径加强教师培训,如集体培训、个别辅导、专业研讨等,满足教师个性化需求,鼓励教师跨层级、跨专业、跨年级开展协同合作与学习,共同理解新课程、新教材。

(二) 构建与新课标、新教材配套的动态资源库

开发与新课程和新教材相辅相成的动态资源库,既是一线教师的渴求,也对促进有效的教学实践,营造一个动态和互动的教育环境具有重要作用。首先,资源库要涵盖广泛的内容,覆盖新课程、新教材所涉及的主题,提供补充的解释、示例和练习,满足不同教学方式、学习方式的需要,增强教学与学习目标的联系。其次,资源库要不断更新和管理,集成易于访问、稳定的多媒体资源、交互工具和补充材料,确保其能够与时俱进,让教师们无缝地将这些资源集成到课堂中。

教师对教材的使用是一个双向互动和反馈的过程。教材使用是为了实现课程实施的目标,针对教科书展开一系列研究活动,这些活动主要包括:对教科书进行理解 and 研究,整合教科书内外的课程资源,运用教科书完成具体的教学任务,以及鉴别和评价教科书的优点与不足等过程。^[6]可见,一方面教材是教师教学的重要资源,指导着教师的教学行为;另一方面,教师还需要整合除教材之外的其他资源,对教材进行补充和评价。

(三) 完善与改进课程结构与内容,减轻中小学课程设置负担

学生学业负担重是每次课改的顽疾,然而目前教学仍表现出教师与学生抢夺时间的情形:教师提前教授高年级的知识是提前抢占学习时间;教师赶教学进度导致学生无暇消化和吸收新知识是恶性压缩学习时间;教师增加课时、减少学生休息时间,是过度使用学习时间。为此,必须深刻认识到过度追求短期教学效果而忽视学生长远发展的危害性。为应对考试或追求短期成绩而牺牲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的教育是片面的、有害的,甚至是危险的。

因此,现阶段的“减负”应注重提高学习质量,在相同时间和精力的前提下,让学习更利于学生发展。这意味着课程结构与内容必须“减量提质”。首先,教师应准确把握教材的编写意图,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加强对教材二次开发的能力。其次,教师应因材施教,以学生的发展为主要落脚点,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选择适宜学生学习的教材内容,灵活运用教材。最后,教材中应优化课程结构,精简课程设置,关注教材内容向学生学习内容的有效转变,注重内容的更新和创新,将课程内容与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相结合,引入趣味性高、实践性强、富有启发性的教学内容。

(四) 增强教材的学科衔接、学段衔接、与社会生活的衔接

教材的衔接要避免出现小学容易、初中还行、高中断崖式难的情况,就要求教育系统不断完善课程的结构体系,确保学科、学段之间的衔接更加紧密。随着课程改革的持续推进,让学校拥有更多自主办学的空间。探索小升初和初升高阶段的“1+3”课程体系将成为诸多学校未来建设和改革的方向。对学生来说,每一次升学都是在对自己的未来,包括兴趣、学历、职业等的选择。如德国普通义务教育的五至六年级是一个确定学校类型的阶段,学生在符合所报考学校要求的情况下,可以自主选择想去的中等教育学校。^[7]倘若学生五年级进入自己不满意的学校,之后也可转入其他学校,即主体中学、实科中学、文理中学和综合中学。四类中学培养目标不同,主体中学以培养职业技能为目标,文理中学注重理论知识和艺术素养的培养,实科中学和综合中学兼顾理论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培养。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为此,针对小升初和初升高的衔接课程,教材中可以加大跨学科的综合学习,设计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更好地理解知识的内涵与价值,能够更好地理解知识世界和生活世界的联系,能够更好地规划未来的学习、就业与生活。

(五) 推动与新课程标准、新教材相应的教学评一体化

一方面,加强素养导向的考试与评价改革。确保依据学业质量标准合理设定评价目标,注重情境在考试命题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基于真实情境的开放性题目设计,探索跨学科试题命制和非书面测试方式,培养学生在面临复杂、不确定问题时,能够综合运用知识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的教材质量,探索多元化的升学、就业与创业渠道,不断改进职业教育的教学效

果,为学生提供更适合自身的教育资源和发展空间,完善国家的升学、就业政策,为升学、就业、创业提供更多元的选择方案与出路,保证处于教育体系中的学生能积极乐观、健康成长,获得适合自己也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总之,教材作为意识形态和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承载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功能。教材的高质量建设和管理不能是一项孤立的工作,它需要从课程目标到课程实施,再到课程评价形成一个全链条,同时还需要全社会的理解、监督和支持,最终实现协同育人。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课题“教材宣传与舆情应对机制研究——基于义教新教材选用与使用的风险评估”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基础教育教材的功能及其实现

王天平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时代加强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与构建高质量基础教育教材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8]。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9]。基础教育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基点,既须全面发力又要重点突破。基础教育教材承载着基础教育教学的核心内容,影响着课程教学的方式方法,是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建设教育强国需要高质量教材体系作为支撑。因此,立足基础教育教材功能,建设高质量教材体系,有助于推动教育强国建设。

一、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基础教育教材的功能定位

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基础教育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是促进个体思想政治教育、身心健康发展及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点^[10],也是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教材是根据特定的教学目标,遵循教学规律,组织并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和技术的知识系统。^[11]它肩负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体现了时代进程中的知识选择,彰显了集体塑造中的文化记忆,是个体知识学习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加强教材建设,打造教材强国,是教育强国建设的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有生力量。^[12]因此,立足社会本位、知识本位、学习者本位三种基本取向,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的基础教育教材要坚持政治立场与育人使命相融合、文化秩序与知识结构相适应、个体经验与社会经验相兼顾。

(一) 政治立场与育人使命相融合

教材是国家对具体课程的基本规范,也是国家意志与国家事权的体现与反映,是社会公共文化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系列因素的影响。教育强国背景下的基础教育教材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并承载着强烈的育人使命,这是由我国教育强国建设的特殊性与教材自身属性决定的。一方面,教材蕴含着鲜明的政治立场,以育人育才为指向。教材从来就不是价值中立的。阿普尔指出,学校知识本身,包括在内的和排除在外的、重要的和不重要的知识都受到一致认同的意识形态的统治。^[13]基础教育教材作为国家向青少年儿童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载体,要在坚守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的

基础上,充分体现党和国家意志,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赓续发展。另一方面,我国教育强国建设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以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基本旨向。基础教育教材在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人才培育中发挥着奠基性作用,能激发青少年创新意识,为促进个体终身发展奠定基础。立足党和国家发展,基础教育教材具有重大时代价值和深远战略意义,能为培养推进国家事业发展与国家战略实施做出贡献的未来人才提供基础支撑。

(二)文化秩序与知识结构相适应

推进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遵循特定的文化秩序,回答和解决好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的基础教育教材建设强调知识与文化秩序相适应发展。一方面,从个体接受教育的历程来看,基础教育阶段是为接受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终身教育打下坚实基础的阶段,高阶知识的获得要以基础知识为基础。^[14]基础教育教材作为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与知识技能体系,在基础教育各阶段学校教育中都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在学前教育阶段,基础教育教材能够向儿童提供活动指导;在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基础教育教材承载着培养学习者逻辑思维能力和传授系统性知识的功能,受到最大程度的重视。另一方面,教育强国建设受到文化体系的制约,以认同强国为必然要求,其置于特定的文化系统中,离不开文化系统的支持。各种行动科学不得不涉及文化体系,正如同不得不涉及“自然界的”事实一样,其间的逻辑关系基本上是同样的。^[15]基础教育阶段是学生初步感知文化的重要阶段,基础教育教材强调遵守文化秩序,顺应社会文化发展规律,承载着弘扬与发展中华文化,彰显中国底色的历史使命,有利于加深青少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与热爱,奠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基础。

(三)个体经验与社会经验相兼顾

在教育强国建设目标统领下,基础教育教材要结合学科知识逻辑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选择学习者个体经验和社会经验,组织、设计、科学编排各学科教材,以适应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确保基础教育教材在促进青少年学习真正发生方面的功能实现最大化。一方面,以事实、概念、原理为内容构成要素编制而成的基础教育教材是一个意义开放系统,它承载着提升中小学生学习水平与提高多方面发展能力的使命。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身心发展呈现出不平衡、不充分性。因此,基础教育教材需关注中小学生的个性化经验与多元化需求,遵循知识发生与中小学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增强其适切性、趣味性和实践性。另一方面,个体生长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其中的每位学习者都是接受和创造知识及社会实践的参与者,教材内容源自社会场域中具有学习者独特烙印的生活经验和精神世界。学习者的个人知识经验及同伴和其他社会主体交往中形成的社会经验是课程内容的基本构成要素,选择学习者经验作为课程内容是题中应有之义。^[16]基础教育教材要主动选择和汲取青少年儿童在改造世界过程中的生产实践经验,引导其开展社会实践并积累社会实践经验,发挥价值实现的社会化功能。

二、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基础教育教材的功能样态

教育强国建设要求发挥基础教育基点作用,这需要基础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课程、教学方式、管理方式等各维度都要强,也要聚焦科技创新与科技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人力支撑。^[17]从基础教育教材与教育强国建设的内在关系来看,一方面,教材是国家事权,体现国家意志,也是教育活动的基础性要件,教育本身强需要以教材强作为支撑;另一方面,基础教育教材承载着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目标任务的基础支撑使命,能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支持力量。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基础教育教材的功能样态体现为价值塑造功能、知识创造功能、结构支持功能三个方面。

(一)价值塑造功能

价值塑造功能是指发挥基础教育教材作用,提供方向指引与内在遵循,引导青少年从内心深处认同

教育强国建设的多重意义,为积极投身教育强国建设奠定基础。在人口大国的国情下,基础教育在塑造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强国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是提高全体人民素质和激发个体创新创造活力的奠基工程,决定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实现,进而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与教育强国建设。而课程教材承载着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以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实现。作为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教材是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战略工程和基础工程,以高质量育人为根本旨归。^[18]基础教育教材作为基础教育人才培养的载体,既能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又能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输送生源,以促进各级各类教育高质量发展。此外,青少年具有较强的可塑性,青少年时期是个体思想政治意识培养的关键时期。基础教育教材在促进能力培养的同时,能帮助中小学生明晰自我使命担当,将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要求基础教育教材要不断汲取人类的文明精华、主流价值与精神食粮,渗透价值观,塑造理想信念,发挥其奠基培元功能,肩负起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历史使命。使学习者从小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坚守正确的方向,提升教育利益相关者对强国建设的认同感,并为引导其积极投身于教育强国建设打下基础。

(二) 知识创造功能

知识创造功能是指基础教育教材能为学习者学习提供内容凭借与资源支持,支持个体创新能力发展,释放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人才能量,为教育强国建设输送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进而提供人力资源支持。基础教育教材需在遵循学科内在逻辑的基础上,通过精选知识内容,汲取人类文化精华,进而构建科学的教材内容体系,为学习者提供学习过程中所需的知识内容资源。教材是学校教育教学的载体与依据,在个体的认知发展、价值塑造、能力培养以及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过程中,肩负着举足轻重的历史使命。^[19]在知识爆炸式增长的当下,个体在基础教育阶段的知识积累是支持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基础教育教材可为中小学学习共同体提供内容凭借、知识资源,进一步激发学生深入思考与学习,不断提高个体问题解决能力。此外,知识创造是影响教材生命力与影响力的重要因素。教材承载着人们从知识内在结构性逻辑和儿童成长需求出发进行选择、处理后形成的教育学立场的公共知识。^[20]教材作为知识的载体,而知识源自个体具有生成性与创造性的经验,基础教育教材既要传播知识,又要融入新的发展内容、文化成果和先进理念,实现知识的创造。基础教育教材还要能适应个体经验的增长与变化,紧扣时代变革,探索新规律,追求新发现,实现知识的创造,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供给基础力量,提供教育强国建设所需的人才、知识等创新要素。

(三) 结构支持功能

帕森斯(Parsons T)指出,社会系统是由不同功能的子系统构成的,社会系统成员的行为或状态的变化将影响该系统的状态及其他成员间的状态和关系。^[21]基础教育教材也是由相对稳定和相互联系的多因素构建而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系统。教材的学科结构直接关联着学生知识习得与能力发展。^[22]基础教育教材中诸要素间的组织方式影响着其功能发挥与教学效果,进而制约着学校教育质量与人才培养质量。在全面建设教育强国背景下,教育强国建设目标的达成以内部教育自身优质均衡、可持续发展、有效人才支撑以及外部强大影响力、竞争力为标志。^[23]基于此,基础教育教材要立足于课程标准的具体要求,遵循中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学习规律,合理设计与编排其内容、封面、色彩、版式,与基础教育阶段不同学科和学段学生视觉感受系统及感知、注意、记忆相契合,各活动板块、栏目、内容的设置要相互配合、比例设置得当。基础教育教材还要联结基础教育阶段各学科知识与个体实践状况,从“教程式”向“学程式”转变,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作为结构编排的核心,促进学生全面、主动、个性发展,为提高教育质量和支持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支撑。此外,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作用,借助知识图谱等技术,以数字化教材资源为依托,提高知识组织结构的系统性,发展立体化形态的教材,构成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的强质量教育体系。

三、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基础教育教材的功能实现

教育强国建设呼唤高质量教材,推进教材建设高质量发展既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提升教材质量的实践之需。^[24]然而,当前虽然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材体系,教材数量多、门类全、受众广,但仍不足以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立足于基础教育教材的发展现状与教育强国建设的使命,基础教育教材要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建立多层次的教材建设制度;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构建自主性的教材资源体系;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形成立体化的教材服务体系。

(一) 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创建多层次的教材建设制度

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教育强国建设下,基础教育教材要扎根中国,树立系统观念,促进教材体系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教材制度建设存在着多元文化相互碰撞,教材核心价值引领性不足,教材行政管理强势、主体协同性不强,教材法治体系疏漏、制度规范性不够,教材管理机制单一,运行效能性不高等现实困境。^[25]为了建立健全教材管理制度,国家已出台了相关文件,如《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但整体而言,基础教育教材建设的制度还有待完善。

针对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中存在的系列难题,需要构建多层次制度,强化教材制度保障。一方面,要明确细化教材的编写、审定、选用、出版、发行等制度。当前我国教材的编写、审定、选用等制度存在着笼统化、宽泛化等弊端,各种类型的教材制度整体存在于一个制度框架中。教育强国建设下的高质量基础教育教材体系要立足于自身的制度优势,汲取他国经验,规范与明晰我国教材编写、审定等制度,构建系列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的基础教育教材建设制度。另一方面,要联结多方主体,构建协同创新机制。教育强国建设下的基础教育教材体系建设涉及多个主体与领域,为了防止各主体间的分裂与脱节,应联结教育领域的主体,建立国家、地方、学校在内的多方联动制度,充分协调与调动国家、地方和学校三者的主体性,形成多方联动的教材治理格局。此外,还要构建与完善基础教育教材准入、淘汰、监督和竞争的机制,为高质量基础教育教材体系建设提供全过程的制度保障。

(二) 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构建自主性的教材资源体系

创新人才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推进力量,其培养是一个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的工程,这要求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都要以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开展创新教育。基础教育阶段作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奠基阶段,是促进学生创新素养培育和发展的关键时期。^[26]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下,抢占科技创新和国际竞争制高点的关键在于促进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人才的培养,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依托于教材。培养高质量人才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与关键,基础教育教材作为基础教育阶段人才培养的载体,教材体系建设与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相连。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全面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并支持促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以形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相互支撑的局面。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的基础教育教材要立足时代前沿,面向未来,构建体现中国特色的自主性教材体系。

一方面,要构建纵横交错的教材资源体系。拔尖创新人才是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力量。拔尖创新人才强调在个体全面发展基础上,指向其综合能力的发展,而当前单一化、分裂化的学科教材难以适应创新人才的培养。因此,在横向上,要突破学科间的知识壁垒,根据不同学科间的内在知识逻辑,优化与重整不同学科间的知识内容,构建学科间横向配合的基础教育教材体系。在纵向上,要联结不同的学段,结合个体的心理认知发展逻辑与教育教学规律,构建具有衔接性、层级性、递进性的基础教育教材体系,并为教材使用的预设性与生成性预留空间与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要构建中国自主教材资源体系。基础教育教材建设要立足自身文化基因,也要聚焦时代特色,构建自主性的教材资源体系。为了更好地发挥基础教育教材的功能以助推教育强国建设,要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重大内容纳入基础教育教材资源体系中,还要积极汲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形成具有特色性与思想

性的中国教材体系。

(三) 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形成立体化的教材服务体系

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的快速发展赋予教育强国建设新的机遇与挑战。智能时代的教育强国建设离不开技术的支持与赋能。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也促进了传统教材的迭代升级,教材呈现方式趋向富媒体化。数字教材作为数字时代教材的新形态,为学习者提供了多样化的教学工具与多样化的教学资源选择,有利于改变传统的学习方式,促进个体自主学习与深度交互。智能时代,须正视与抓住数字化转型这一契机,为基础教育教材建设提供支持保障,形成立体化的教材服务体系。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教材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助推教育强国建设,需要构建立体化的教材服务体系。一方面,构建数字教材建设标准体系,形成数字教材的设计—开发—应用标准体系。数字教材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使其成为纸质教材的重要补充,但在实践过程中,由于缺乏明确的标准体系,数字教材的开发质量与实践运用受到制约。因此,应立足利益相关者角度,构建数字教材的设计、开发、应用、治理标准,形成数字教材建设标准体系,为数字教材的发展提供指导。另一方面,要为数字教材建设打造人才—基地—平台为一体的服务体系,构建专业队伍、提供发展基地、打造平台系统。高校还可设置相关专业,通过对教材相关研究群体进行多学科知识培训,以学校为依托,打造专业的基础教育教材研究队伍,鼓励进行教材理论研究。在此基础上,还要加强数字化教材的课堂教学应用研究,为数字教材的有效与创造性使用提供基础保障,打造数字化教材应用示范校和示范区。此外,还要搭建与完善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在广泛吸纳优质资源的基础上,形成“资源+平台+服务”的教材建设格局。

本文系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委托重大课题“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研究”(项目编号:JCSZD2024KCZX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新课标背景下重大主题教育进教材的时代价值与实现理路

李洪修

(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指导下,教材已完成了新一轮的修订与完善。重大主题教育紧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内容涵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劳动教育、国家安全教育以及生命安全教育等多个维度。重大主题教育有机融入教材,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教材的思想性和科学性,完成培育时代新人的任务与使命。

一、重大主题教育进教材的时代价值

(一) 全面落实国家事权,保证思想性与方向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教材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27]强化重大主题教育进教材既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育人要

求,也是回应时代发展的历史使命和任务。从重大主题教育的内容来看,优先选取关系到国家生存、社会主义发展、民族血脉延续等九个主题内容,涉及“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等教育的根本性问题。在教材中深化重大主题教育,不仅能够彰显国家意志,确保教材建设的思想导向与国家事权相一致,还有利于推进教材内容构建的科学化与系统化,使其成为传播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法定知识体系^[28];而且,这一举措有力地巩固了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厚植家国情怀,有利于培养一批听党话、跟党走,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 完成培根铸魂任务,提升文化认同与育人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课程教材建设要发挥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功能。^[29]在全球思想观念的多元交汇与文化碰撞的背景下,学生的思想活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特点,这对他们文化认同以及身份认同来说是一项复杂的挑战。^[30]在此情境下,重大主题教育不再是孤立的知识点罗列或简单的主题素材的堆砌,而是一系列承载着历史脉络与时代变迁的文明成果,它们深植于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蕴含着深刻的思想信仰和精神力量,有利于发挥精神塑造和价值观引领的作用,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文化认同。重大主题教育以学科教材为依托,旨在借助重要主题中蕴含的丰富知识与精神财富,激发学生的理性思考与人文关怀。它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汲取知识养分的沃土,更引领他们感受主题背后所蕴含的深厚精神底蕴。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例,一方面,通过引导学生传承并弘扬中华文明系列优秀成果,了解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实践智慧,以增强文化认同;另一方面,通过结合教材内容深化学生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提升学生的身份认同感和历史使命感。

(三) 充实教材内容结构,提升教材建设质量

重大主题教育的相关内容生成于人类社会生活实践之中,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总结与概括,蕴含着人类的实践智慧,既承载着文化传承的历史意义,又发挥着重要的育人功能。^[31]重大主题教育进教材有利于充实教材的内容结构,提升教材建设质量。具体而言,一方面,重大主题教育的引入更新并丰富了教材内容,回应了时代发展的重要关切,为进一步提升教材建设质量开辟了新的路径。重大主题教育主要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等九大主题教育内容。不同的主题内容对接到相应的学科教材之中,为拓展教材建设空间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资源,也为教材内容的丰富性提供了有力抓手。另一方面,重大主题教育促进了教材内容结构的优化与完善,构建起了更为全面的育人知识体系。在原有知识体系基础上有机融入重大主题教育的内容,有利于完善并深化教材内容组织结构,增强教材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以及思想性,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保障了教材建设的质量与水平。

二、重大主题教育进教材的实现方式

(一) 立足学科教材基本内容,有机融入不同主题要素

第一,以不同教材内容为基本框架,覆盖不同主题内容要点。重大主题教育的内容生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进程之中,凝练并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制度以及实践成果,其涵盖范围广、涉及内容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领域。在每个主题教育的细分之下,内容的广度同样显著,如生命安全教育与健康教育,包括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心理健康、安全应急与避险等五个方面(每个方面又划分了三十个核心要点)。鉴于不同主题教育内容构成要素广泛多样,本次重大主题教育内容融入教材的工作首先厘清了不同主题教育内容究竟涵盖了哪些关键的构成要素。其次,结合重大主题教育内容的内涵与外延,明确了应当着重融入哪些核心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依托特定学科教材实现有效融合的具体策略。新课程标准引领下的教材修订并不是将所有主题抑或是某一主题的全部内容平等地融入不同学科教材之中,而是根据每门学科的特色与定位,有选择性地、精准地嵌入相契合的主题内容,以保证重大主题科学合理地、有机地渗透在不同学科以及不同学段的教材之中。例如革命传统教育

以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语文、历史这三门科目来开展,同时在艺术类学科(音乐、美术等)中予以重点体现,并在其他学科中适度而巧妙地融入。

第二,依据不同学科新课标精神,适当融入相关主题内容。此次重大主题教育融入教材的过程,摒弃了过往机械式的“添加”“掺杂”“放置”等简单操作,转而追求在教育目标与内容上的深度融合与高度统一。具体来看,重大主题教育进教材首先立足学科特性,即依据各学科的独特属性和教学目标有机融入与之高度匹配的主题教育内容。例如,语文教材结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课程内容要求,采用了以历史故事、古代诗词、革命英雄人物代表性作品、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的重大成就等为主题教育的主要呈现方式。道德与法治教材以学科内容为主框架,将国家安全教育、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信息素养教育以及金融素养教育等融入不同章节。本次教材的修订工作,以学科内容为基石,紧密围绕新课程标准的核心要义,在全面且系统研判了哪些重大主题教育内容进入哪门教材之中,以及进入教材的程度与尺度的基础上,有机整合了适合纳入教材之中的重大主题教育内容,保证了重大主题教育内容与学科特质相吻合。

(二)采用多元化渗透方式,扩大主题教育内容覆盖范围

第一,丰富重大主题教育内容的呈现方式,扩充其覆盖范围。一方面,采用正文和栏目系统相结合的方式。过去教材通常仅限于课文正文或随堂练习中融入核心主题,而新版教材则突破了这一局限,增设多样化的专栏作为补充,以初中物理教材为例,在“观察与思考”“实验与探究”“归纳与总结”“实践活动”等多个栏目都进行了相关主题元素渗透。这有利于为学生立体化、多视角展现学科内容背后所蕴含的知识、思想、思维方式等生成与发展演变过程,还原重大主题教育的历史责任感与文化沉淀感。另一方面,采用显性呈现与隐性渗透相结合的方式,彰显教材内容所负载的深层文化底蕴。其一,显性呈现主要通过附加说明和直接使用两种形式,例如数学教材中有数学家肖像并附以生平简介,或者直接选用源自古典文献富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学案例。其二,隐性渗透是指将某一重大主题教育内容的典型素材作为情境导入,引导学生潜移默化地感受。如学习“运动的水分子”时,可以结合“独木不成林”的俗语,以此微妙地传达即便微小如分子,众志成城亦能成城的观点,隐喻集体团结的强大力量。

第二,内容载体形式丰富,多形态呈现重大主题教育内容。要保证重大主题教育与教材内容之间实现有机融合,关键在于要在深刻把握若干重大主题教育本身的特点与属性的基础上,明晰重大主题教育进教材的逻辑理路。因此,此次重大主题教育进教材过程中特别关注了不同主题内容的结构化分解与综合性表达,通过中介性转化、多形态转化、多层次转化等形式实现其在教材中的立体化呈现,在确保重大主题教育内容的价值与事实的双重属性基础上,充分融合了学科教材内容。一方面,针对不同学科内容特性,精心挑选与重大主题教育高度“契合”的载体,强化两者间的内在联系、顺畅过渡及保证整体一致性。如语文教材通过汉字、书法、成语、格言警句,传说、故事,古诗词与散文、古典小说等多样化载体形式引导学生了解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创新与丰富重大主题教育的呈现方式,增强相关内容的直观性、生动性。新版教材以文字、图片以及图文结合等多种方式对重大主题教育内容进行立体化呈现,强化整体育人功能。

(三)以统筹设计为基本原则,整体编排重大主题教育内容

第一,构建横向联动的知识图谱,增强内在关联。重大主题教育融入教材的过程中,成功搭建了横跨各领域的知识互联网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以主题内容为引领,统整了基于某一学科教材内部的主题元素。通过将学科教材的核心知识与重大主题教育的相关素材巧妙融合,整理出基于学科内部的重大主题教育主题单元,构建了学科内部知识的结构性图谱。以革命文化进语文教材为例,结合革命传统文化的主题要素,将语文教材中所包含“国家、政党、榜样、民族精神”这四个范畴的内容进行归纳并分类。其二,以不同主题内容为主轴线,促成了不同学科教材之间的横向联动。此次整合以单元或章

节为最小操作单元,跨越学段,整合各类学科知识,如以爱国主义为线索,筛选语文、道德与法治、历史等人文类学科教材内容中的爱国元素,构建出了基于多学科协同的专题知识图谱。

第二,完善纵向融通的整体架构,促进整体联动。重大主题教育在教材中的融入,构建了一套纵向上相互衔接的整体框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强化了重大主题教育内容在不同学段上的衔接性。此次重大主题教育进教材过程中,在结合学科课程标准及教材内容的基础上,精准对接了不同学段中对学生的目标要求,确保了主题内容与教育阶段匹配性。如初中阶段(7—9 年级)是学生“三观”形成、人格塑造的关键时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循序渐进融入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32]另一方面,充分挖掘并利用不同教育阶段与教材之间的协同潜力,依据各阶段的培养目标及教材具体内容的差异,精心构建了一幅层次分明、逐级递进且相互衔接的知识体系图谱。二是增强了重大主题教育与不同学段教材之间的衔接性。此次重大主题教育进教材,结合不同学段的教材中相同的主题、单元或模块进行整体化设计,确保了重大主题教育内容全面地、系统地、准确地覆盖到不同学段教材之中,避免了主题教育内容在不同学段中出现内容断层、遗漏或重叠等现象,进而构建起连贯、有序的教育链条。

三、落实重大主题教育进教材的教学建议

(一)以教材内容为主要抓手,明确重大主题教育融入思路

第一,把握教材内容的价值负载性,全面提炼重大主题教育元素。重大主题教育的相关内容并不是简单罗列在教材内容之中,而是以隐性的方式渗透在相关章节或主题单元里。因此,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需要在全面理解学科教材内容的基础上,系统挖掘知识点中所蕴含的重大主题教育元素,并结合其背后所涵盖的历史故事、文化背景、典型事件进行表达与阐述。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例,首先,教师需筛选出蕴含教材内容的不同章节或单元,判断并识别出与之匹配度较高的重大主题教育内容。其次,结合不同学科教材内容,重点提取其中可以延伸或拓展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点,深入挖掘并提炼其中的文化精髓与教育价值。在此过程中,教师需要重点关照的是,提炼重大主题教育元素时应从学科教材内容本身出发,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文字描述,还应充分利用教材中的插图、思考与讨论、实验、拓展学习等辅助栏目,对其进行内容分析,提取重大主题教育的相关元素。

第二,选择适切的素材与事例,有机融入重大主题教育内容。教师须确定不同学科教材融入重大主题教育的类别与维度,重点关注本学科教材与其他学科教材之间的共通性与联动性,确保重大主题教育全面、系统、精准地呈现出来。以重大主题教育的内涵与外延为依托,教师应在充分理解不同主题教育的相关政策文件内容要求的基础上,按照教材内容中涉及的不同知识领域、知识呈现方式等维度进行全面剖析。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需要注意的是,所拓展的主题教育素材,既要充分考虑素材本身是否能够全面展现某一重大主题教育内容,还要考虑素材内容与本学科教材内容的关联程度。具体而言,教师应对教材内容本身进行系统分析,重点考虑本章内容能够与哪个主题进行匹配,接着将可能涉及主题教育元素的知识点进行背景性扩充。

(二)创新教学方式与思路,持续推进重大主题有效落实

第一,以共性融通为基本理念,实现重大主题的内容转化。鉴于重大主题教育内容本质上具有宏观性与抽象性等特征,教师须创新教学方式与思路,秉持共性融通的理念与原则,实现内容的精准转化与有机融入。一方面,教师要促使重大主题教育内容与教材内容之间的准确对接,在不肢解教材内容的基础上适当嵌入主题内容。比如,将重大主题教育融入与之相关的学科史和科技发展前沿之中,让学生从学科历史发展长河中感受文化的沉淀与赓续。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对重大主题教育的表达方式进行创造性转化,将其中蕴含的深刻思想、哲理、文化等转化为兼具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和生活性的学习内容。比如,教师可以选取具体的、生动的事实和热点事件等,以讲故事与讲道理相结合、生动案例与抽象概念相

结合的方式,结合教材内容,提升整体教学的立意与吸引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深度思考。

第二,丰富学生情感体验过程,强化学生对重大主题教育的价值体认。教师要不断强化重大主题教育本身与学生内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情感体验等的深层关联,以增强学生对重大主题教育内容的内涵和价值认识。一方面,针对不同学科教材内容,教师可以适当增加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如仪式教育、场馆参观等,让学生通过真实性的感受以及具身性的参与增强对不同主题教育内容的理解与感悟。另一方面,教师要把理论性内容转化为教材性话语,紧密围绕学生生活学习实际,开展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同时也要结合教材内容进一步挖掘不同主题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精神力量,既要注重事实与理性,又要彰显以社会为导向的信念引领与价值导向,通过丰富学生情感体验过程,强化学生的价值认同,激发其情感共鸣,从而深化育人效果,培养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与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未来公民。

(三) 注重教学资源库建设,提升重大主题教育实施水平

第一,丰富配套教材资源素材,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一方面,要丰富资源素材类型,包括文字、图片、图表、动画、视频、音频等多元化学习素材,使得重大主题教育过程更加生动、直观。具体来看,教师可以根据学科教材类型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资源素材;可以增加数字化在线资源素材,方便学生随时学习、分享与交流。另一方面,以社会时事热点为依据,及时更新与调整配套资源素材。教师可以选择当前社会关注度较高、影响范围较广的事件、问题或现象作为资源素材建设的重点,并对其进行深度解读,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重大主题教育元素,通过案例分析、讨论交流等方式,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与分析,增强学生的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二,优化相关案例资源开发,提升重大主题教育教学效果。一方面,教师要融合学生发展逻辑与教材逻辑,确保案例资源的有效性与适切性。案例资源开发过程要首先考虑学生的认知水平以及学习背景,在保证案例思想性和方向性的基础上避免过于复杂或简单。其次,教师要确保案例编写的结构化与连贯性,让学生能够全面系统地了解案例或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教师要注重案例开发的适宜性、丰富案例内容的情境性、强化案例内容的启发性。基于重大主题教育的案例资源开发过程要站在教育学立场上,特别强调从案例中生成的教育性意义与价值,仔细斟酌所设计的案例资源是否能够给学生带来精神层面的思考,是否能够让学生在伦理与道德层面上升华,是否能够赋予学生生命历程以深刻的价值。

本文系 2022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双减背景下基础教育课堂形态及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2JZD04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再论建构教材学:基于学科学视界的分析^{*}

余宏亮

(人民教育出版社期刊编辑室主任、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教材研究历经百余年的积累沉淀,研究重心逐渐从显在的知识选择、文本分析、纵横比较等传统论域,向深层的政治导向、价值立场、文化底色等时代关切转移。伴随这一进程,教材研究成果逐渐从经

^{*} 关于建构教材学这一命题,笔者曾于 2021 年作过首论,具体可参阅:余宏亮,《通向根脉与面向未来:建构教材学的基础、逻辑与方略》,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 年第 2 期,第 30-39 页。

验化、碎片化向理论化、体系化迈进。如今,推进教材研究的规范化、学科化发展,探索教材学的学科自立之道,既是教材研究从散点开掘走向体系集成的范式更新之需,也是构建中国特色教材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创新之要。

作为一门后发崛起的新兴学科,教材学建构有必要以学科学为指导,加以前瞻擘画、整体架构。学科学以服务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推动人类知识的体系化、理论化发展为目的,其基本任务是揭示学科定义、分类、结构、形态、特征、更替、衍生、周期、动力、方法、传播、流派、组织和预测的一般规律^[33],能够为新学科崛起揭示发展规律、提供决策依据。当前,我国教材学正处于从自发生长走向学科规范的关键阶段,基于学科学的视界,梳理学科发生条件、澄明学科身份定位、勾勒学科体系结构、研判学科发展方略,对于把握教材学的学科生长规律大有裨益。

一、教材学学科发生的时空条件

(一)教材学学科领域的自发与自立

从学科的生发逻辑来看,学科形成可分为演绎学科与自发学科,教材学属于后者,萌生自教材作为长期存在的教育客观事实与其角色意识的自然觉醒,以及对自身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高阶发展的学术呼唤。从学科史的角度来看,教材研究酝酿于清末新式教材的编译充用,萌生于教材话语形式的白话文转换,勃兴于依学制、按学科、分年級的配套编制。在百余年的进程中,我国教材研究历经了变革维新潮流下的“萌生—勃发期”、政权迭变时局下的“多元—活跃期”、文化激荡背景下的“规整—跌宕期”以及改革开放政策下的“复苏—繁荣期”的阶段演化^[34],已然发生了教材现象问题化、教材问题领域化和教材领域学科化的渐进质变,从教育学整体范畴中初步分化出相对排他性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概念体系和基本论域,正在成为一门具有普适性的独立学科。

(二)教材学学科知识的积淀与累进

知识的生产与累积是学科生发的逻辑前提。从早期张钰编撰的《小学教材研究》(1932)、吴研因编著的《小学教材研究》(1933),到近期曾天山的《教材论》(1993)、王郢的《教材研究导论》(2016)、石鸥的《教科书概论》(2019)等,教材学始终保持知识的持续增长和渐进积累。首先,表现为对教材基本原理的揭示日益走向精深。启动于新世纪之交的新课改推动了教材研究的空前繁荣,教材研究的论著不断涌现,学科知识激增,包括基于教材本体逻辑,对教材内涵、本质、特征、类型、功能、价值、要素、理论基础等命题的澄明;包括基于教材生成逻辑,对教材编写、教材审定、教材评价、教材管理等层面的探析;也包括基于教材使用逻辑,对教材教学、教材学习、教材监测等主题的探寻。其次,表现为教材研究方法的迁移融汇。当前的教材研究在历史研究法、文本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的基础上,还新增了教材元分析、教材叙事分析、教材话语分析、教材接受分析等多元方法的应用。再次,表现为教材研究范畴的深度开掘。当前相关研究开始聚焦教材的多元性、异质性、动态性特征,衍生出教材知识话语、教材知识选择、教材形态迭代、教材伦理守护、教材管理变革等诸多新的论域。

(三)教材学学科资源的增长与协同

首先,是常态化开设教材研究课程和讲座。比如首都师范大学已面向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教科书研究”“教科书评价”等课程,东北师范大学将“小学数学课程标准与教材分析”“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与教材分析”列为教育学本科阶段主干课。此外,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近年来也不断增开教材研究相关课程或讲座。其次,是专门性学术发表平台快速增长。比如,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主办有《课程·教材·教法》(1981)、首都师范大学定期出版《教科书评论》(2014)、我国台湾编译馆创办有《教科书研究》(2008)等刊物,同时《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全球教育展望》等高水平综合类教育学刊物相继增设教材研究栏目,教材研究刊文数量明显扩大。再

次,支撑性教材学学科生长资源日益充盈。聚焦教材研究的国家级课题、高水平论著数量快速增长,并围绕教材建设和研究成果设立了国家奖项。全国性学术交流平台也明显增多,如首都师范大学连续举办11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教科书学术论坛,人教社接续举办多届中小学教材论坛等。最后,集群化教材研究学术队伍不断壮大。近年来,国家教材委、教育部高度重视教材基础研究,先后两批遴选建设25个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一批高校和出版机构也相继组建教材研究智库,有力推动了教材的有组织科研。目前,形成了以人教社的全学科教材编写、整理、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的百年教材史以及教材交叉学科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材政策与评价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的教材评测研究等为代表的教材研究集群。

(四)教材学学科范畴的开掘与拓展

无论是基础学科,还是应用学科,其赖以存在的根由都在于解决特定领域内的理论或实践问题,深化人类认知能力,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学科应用范畴影响甚至决定学科的生存权利、延伸空间和生命活力。教材学并不是仅以特定的教材文本为研究对象,其学科应用范畴关涉教材由创生到使用全过程、全要素。其一,通过教材研究及时反映人类知识发展进步,能够满足教材内容和形式革新的需要;其二,通过教材研究补充更新教育基本理论版图,有助于揭示隐藏在教材现象背后的教材规律;其三,通过教材研究保障教材编审研用质量,能够满足提升教材品质和使用效能的需要;其四,通过教材研究提升教材的培根铸魂、启智增慧功能,能够满足教材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需要。因此,教材学的多维功能赋予了这一学科明确的发展任务与发展向度。换言之,教材学学科功能的发挥能否反哺社会与人的需求,是检验自身学科存在必要性的核心观测点,也是检验其学科发展动力的重要参照系。

(五)教材学学科规训的形成与强化

福柯基于“知识”与“权利”的关系,认为学科是“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35],后经华勒斯坦、霍金斯、沙姆韦、达维多等人的发展与演绎,学科规训逐渐成为检查、评估、衡量学科化程度的重要概念。作为一种高度制度化的知识生产形式,学科规训是学科知识、资源累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也是学科的内部知识与外部建制向规范化演进的重要表征。教材学学科规训的目的在于,依据教材学的学科特点形成本学科的制度规范,从而建立学科秩序。当前,教材学已具备了学科规训的初步架构。一是通过教材相关课程、讲座、会议的开设以及课题、刊物、论著等的支撑,为教材学学科知识的准入、分类、贮存、传递、增殖、规限提供了保障,形成了以学术训练为主要形式的人才培养制度,促成了教材学的知识规训。二是通过组建课程教材研究所、遴选教材重点研究基地、打造教材研究智库,汇聚教材研究人才,开展有组织的教材研究,促进教材学学科意识觉醒,形成了教材学的组织规训雏形。三是教材研究由初期经验主义为主的教材解读,逐渐走向教材理论与实践同步推进、教材建设与管理持续深化的研究格局,推动教材学由“前范式研究”到“自范式研究”转向,初步构成了教材学的研究规训。

二、教材学学科身份的定位分析

学科身份包括一门学科自身属性的特征表述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表述,既决定了学科自身的归属问题,也决定了学科阐释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学科身份的确定,一方面需要在所属学科群落中确定自身相对独立的特殊地位,即学科的属性定位;另一方面需要厘清自身在学科生态中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层级,即学科的关系定位。

(一)教材学是教育学群落网络的支撑性学科

不同于教育社会学、教育文化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管理学、教育经济学、教育技术学等“教育学+具体学科”式的横向学科拓展,旨在通过其他学科的原理、方法、逻辑解释教育现象或解决教育问题,教材学是教育学学科知识精细化发展的产物,属教育学内部独有的分支领域。教材是教育活动中特有的客观事物,作为教育内容的物化载体,教材是连接课程与教学、连接教师与学生的重要纽带,承载着国家意志和

育人旨趣,是教材编写者、教材使用者、教材学习者长周期、多轮次、精细化研磨的知识范本,是课堂场域中构成教与学活动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因此,教材学应属于教育学学科网状结构中的重要支撑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既相对独立又互为依存,具有广泛而紧密的联系,教材学的学科定位应与课程论、教学论等同,应成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

(二)教材学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复合性学科

从学科生长的基本规律来看,不同学科之间既相对区隔也相互渗透,使学科处于“活”的动态发展之中^[36],这种态势也侧面反映了学科的生长活力。作为学科生态组织中的节点,教材学关涉的知识内容具有极强的论域辐射性,天然具有与众多相关学科交叉的优势。具体来说,与教材学强相关的交叉学科可分为以下四类。一是以课程论、教学论、学习论、知识论等为代表的教育学学科,可为教材研究的基本理论构建提供基础话语范式;二是以发展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学习心理学等为代表的心理学学科,可为教材的知识选择、知识组织、知识教学提供科学依据;三是以编辑活动论、编辑过程论、图书设计学、编辑美学等为代表的编辑学学科,可为教材的编制和呈现提供可操作性的工作指南;四是与其他各学科的交叉,教材作为教学科目的知识载体,除了直接呈现语文、数学、外语等科目的学科知识之外,它在学科层面上还具有广泛的交叉性,诸如教材语言学、教材生态学、教材伦理学、教材社会学、教材传播学、教材符号学、教材美学等,都是教材学理论深化的生长点。

(三)教材学是理论与实践兼重的综合性学科

一方面,教材学是一门遵循学术逻辑的基础性学科。教材学的学科任务包括基于严密的理论推演,澄明、解释、判断教材相关理论概念、关系与价值,揭示教材现象、教材问题的内在规律与原理,构建、完善教材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从而实现对教材本质的科学认识。另一方面,教材学也是一门遵循应用逻辑的实践性学科。源于实践、面向事实、解决问题是实践论视界中教材学的功能指向。因此,教材学具有鲜明的应用取向和实践关怀,其理论建构皆以指向教材实践为旨归,以现实问题与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洞察教材事实现象,解决教材在研制、编校、出版、审核、使用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为学科目的,关怀教材应用实践,依据学术逻辑观照并回应教材应用问题,赋予实践以行为规范、技术规范,指导教材编审研用主体由经验性实践转为理性化实践。

三、教材学学科体系的构成维度

学科体系是整合一个学科领域自身知识内容而成的系统结构,直接反映了学科知识的结构、形态与特征,也是一个学科建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基础依托。

(一)教材学的学科结构

教材学以广义的教材为研究对象,既包含教材本体,也包含围绕教材展开的各类活动。从学科范畴来看,教材学包括基础教材学、应用教材学、学科教材学、交叉教材学和比较教材学五大谱系^[37];从学段层级来看,教材学包括基础教育教材学、职业教育教材学、高等教育教材学、成人教育教材学等几大部分;从教学科目来看,教材学可细化到语文教材学、数学教材学、历史教材学等诸多分支学科领域;从教材类别来看,教材学包括一般教材学、统编教材学、地方教材学、乡土教材学、校本教材学、特殊教育教材学等几大板块。不同划分标准下的学科内容并非泾渭分明的存在,上述划分标准构成了教材学学科内容的四大基本维度,形成了立体交叉式的学科矩阵结构。

(二)教材学的方法体系

总体而言,教材学遵循质化研究、量化研究和混合方法研究三大研究范式。其中,教材的质化研究主要应用于阐释教材文本意义和剖析复杂教材活动等问题,其解释与分析依据通常来源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符号学、技术学等多元学科。教材的量化研究主要应用于对教材现象的客观评估与测

量,基于数据推导验证问题假设。然而,质化研究需要依据量化信息,量化研究也通常需要质化阐释厘清要素关系。据实而论,在方法上要么偏向定量要么偏向定性,这种长期执于两极、方法单调的教材研究已在深度与广度上受到限制。因而,教材研究应依据研究对象与问题特征采用混合方法。作为一种可扩张、可包容的方法论,混合方法大于质性与量化的简单相加,应合理研判混合方法使用的时机、顺序和策略。

(三)教材学的学科文化

首先,作为教育学的分支论域,教材学承继了传统教育学的价值观念和治学精神。可以说,中国传统教育文化土壤滋养了中国教育学的底色、底气和底蕴^[38],赋予了教材学以浓厚的文化气韵,为学科的萌发与赓续提供了坚实的学术规范。其次,作为培养人的思想理论,教材学形成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价值共识。它始终秉持铸魂育人的学科立场,担负着推进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根本遵循。最后,作为中国式的新兴学科,教材学砥砺了根魂并育与兼容互鉴的学科品格。它恪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和“时代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宏阔视野透视本土教材问题与现象,秉持文化自信立场和开放包容理念开展交流互鉴,汲取国际先进教材理念和教材研究方法,构建中国特色教材理论,观照中国本土教材实践。

四、教材学学科建构的基本进路

当前,教材学正处在由“潜学科”向“新学科”跃升的关键时期。因此,顺应学科生长规律、激活学科内驱力量、完善学科外部建制,是推动教材研究立论成学的关键之举。

(一)顺应学科发展规律,把握学科创生时机

一是强化学科意识引领,梳理学科生长逻辑。从学科史的角度看,教材研究已然呈现出由领域向学科演化的趋势,教材研究学科化势在必行。因此,增强教材学的学科意识,顺应学科生长的规律,厘清教材学的学科特性和学科定位,有助于消解对教材学模糊化、边缘化的片面认识。二是立足学科整体布局,制定学科建设规划。突出教材学的相对独立性,从教材现象与问题出发,研判学科价值,明晰学科任务,明确学科基本问题,尤须加强对教材学概念体系与方法体系的构建。三是协调学科生态群网络,保障学科持续发展。探索教材学的学科构建,不仅需要把握学科内部分支结构,还须着眼知识间客观存在的普遍联系,弥合学科间隙,推动学科耦合,在学科生态网络中构建教材学学科链式,促进知识的生产、吸收、共享与传递,加速知识生产与知识流动,从而焕发学科生命活力。

(二)激活学科内驱力量,开掘拓展学科谱系

一是拓展学科问题疆界,增强知识生产动能。学科建设以知识创造为首要任务,知识生产是学科发展的核心功能和根本动力。要通过“固本强基”“补缺补弱”和“跨界融合”的问题域转换,切实提升学科知识生产能力,以实质性、创新性、本土性学科知识生产驱动学科建设。二是创新学科组织架构,促进知识集成创新。学科的诞生与成熟源自学科专业知识体系的组织化推动。要形成教材学学科建制化、专业化、稳定化发展格局,应当改变以往教材研究浅、散、浮、泛的分散格局,加快教材学由“自发生长”向“科学规范”转变。三是突破学科界限,拓展学科交叉融合。要诊断社会实践需求,以跨学科研究视域促进教材学与其他关联学科间的学科综合与学科交叉,生成新的分支论域。要打破传统知识分类导致的学科壁垒,探索学科边缘融合创新,带动研究方法、研究技术的迁移应用,推动教材学学科亚类的形成与分化,拓展和丰富教材学的学科谱系。

(三)完善学科社会建制,构建良性学科环境

一是夯实教材研究学术共同体。创设协同机制,促进教材研究“学院派”“学用派”“学编派”三派融汇合流,提升教材理论批判的建设性、教材教学应用的反哺性、教材编研审管的科学性,形成一个多维聚

焦、相互资鉴、和而不同的教材学术研究共同体。二是优化教材学学科制度环境。建立完善的学科准入制度、学科规范制度。可在师范大学开设教材学专业,搭建支撑教材研究的人才培养制度;规范教材学学科训练制度与研究制度,加强学科规训,创新教材研究范式;完善学科评价奖惩制度,激励引导学科良性发展。三是搭建教材研究的交流平台。整合学术组织,设立全国教材专业委员会;加大科研牵引力度,增设教材专项基金项目;优化学术期刊结构,支持创办新刊、做强教材栏目;加强国际交流互鉴,讲好中国教材故事。

本文系中国教育学会2020年度教育科研专项课题“中小学教科书评价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20JYX013411ZB)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胡定荣.中国课程改革四十年:上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2-3.
- [2] 杨明全.新一轮义务教育课程修订基本精神[J].教育研究,2022,43(8):77-84.
-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21-07-01)[2024-06-10].https://www.gov.cn/xinwen/2021-07/01/content_5621847.htm.
- [4][8]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1).
- [5] 冯加渔.创建世界一流的学校教育体系——英国学校白皮书《教学的重要性》解读及其启示[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2(3):1-6.
- [6] 孔凡哲,史宁中.教师使用教科书的过程分析与水平测定[J].上海教育科研,2008(3):4-9.
- [7] 赵文艺,方蕾蕾,冯永刚.从普职分离到普职融通的发展——德国基础教育学制发展研究[J].基础教育参考,2023(9):29-39.
- [9][29]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N].人民日报,2023-05-30(1).
- [10] 马晓强,都丽萍.建设教育强国:基础教育的新视野与新行动[J].中小学管理,2024(2):32-35.
- [11] 曾天山.教材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14.
- [12] 罗生全,吴志敏.“大教材观”与教材强国建设[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0(3):203-212.
- [13] 迈克尔·W.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M].黄忠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65.
- [14] 靳玉乐,王鉴,吕立杰,等.教育强国建设:基础教育的使命及其践行(笔会)[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11(4):11-32.
- [15] 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M].张明德,夏遇南,彭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862.
- [16] 教育学原理编写组.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234-235.
- [17] 褚宏启.建设教育强国,基础教育何为?[J].中小学管理,2023(11):60.
- [18] 王厚红,陆卓涛,赵晓雨.高质量课程教材建设:价值追问、现实路径与未来展望——第四届全国课程与教学青年学术论坛述评[J].全球教育展望,2023,52(5):119-128.
- [19] 李泽林.教材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意蕴[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3,22(6):14-16.
- [20] 吴小鸥.教师的教材转化能力及其实现[J].课程·教材·教法,2023,43(10):18-24.
- [21] 塔尔科特·帕森斯,尼尔·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对经济与社会的理论统一的研究[M].刘进,林午,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8-9.
- [22] 李俏.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探索和实践[J].教育研究,2014,35(1):105-110.
- [23] 朱永新.教育强国建设:内涵、挑战与实践路径[J].中国远程教育,2023,43(10):1-10.
- [24] 王娇娇,张增田.新时代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成就、问题与建议[J].教育科学研究,2023(10):5-11.
- [25] 张振,刘学智.教材制度建设的困境与超越:国家治理视角[J].中国教育学刊,2020(10):53-57.
- [26] 欧阳玲,王飞.拔尖创新人才基础培养的与实践与思考——以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为例[J].中国教育学刊,2023

- (12):91-97.
- [2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654.
- [28][31] 罗生全, 周莹华. 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J]. 当代教育科学, 2023(1): 32-39.
- [30] 田慧生. 强化重大主题教育设计, 增强课程教材育人功能[J]. 教育家, 2021(39): 6-7.
- [32] 于惠玲, 刘乐, 闻婧, 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研究[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 2023, 24(3): 13-18.
- [33] 陈燮君. 学科学导论: 学科发展理论探索[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1.
- [34][37] 余宏亮. 通向根脉与面向未来: 建构教材学的基础、逻辑与方略[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1(2): 30-39.
- [35]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discourse on language[M]. translated by A.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Pantheon, 1972: 224.
- [36] 叶鹰, 金玮. 科学学的基本规律探讨[J]. 科学学研究, 2000(2): 16-18.
- [38] 李栋. 论中国教育学科体系的构建[J]. 教育研究, 2023(12): 39-52.

[责任编辑: 罗雯瑶]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New Textbooks Based on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um)

ZHANG Chun-li WANG Tian-ping LI Hong-xiu YU Hong-liang

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education textbooks lay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education nation. In view of the new problems that may arise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new textbooks, the existence of policy blind spots and practice deficiencie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trong curriculum reform support system to ensure the steady progress of the use of new textbooks. Basic education textbooks should adhere to local realities and interests and establish a multi-level textbooks construction system;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and build an autonomous textbooks resource system; and accelerate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form a three-dimensional textbooks service system. To organically integrate major theme education into textbooks, it is necessary to target the basic content of subject textbooks, cover different thematic elements, adopt diversified penetration methods, and coordinate the arrangement of major theme education content. With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disciplining of textbook research, textbook research has been established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with universality.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textbook science is also a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way to build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textbook researc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new textbooks;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country in education; education on major themes; textbook research